宋庆龄首次访问莫斯科纪事(下)

◆ 陆其国

蓄意制造的政治暗箭

那是1927年10月中旬,英国《每日邮报》及美国、比利时等一些国家的媒体、包括美联社的电讯相继捏造有关宋庆龄的所谓新闻,造谣说“孙夫人与陈友仁在莫斯科结婚”,甚至还杜撰出“这对新夫妇想要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这样荒诞不经的故事。

诚如爱泼斯坦指出的,宋庆龄深深明了“这是蓄意制造的政治暗箭,使她这次勇敢的莫斯科之行失去光明正大的意义,而降格为‘肥皂剧’剧情中常有的一场私奔”。

宋庆龄当即从莫斯科打电报到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宋宅,要求其家人向首先传播此谣言的英国《每日邮报》“根究谣言之由来,如无满意之更正,即委任律师至英京控诉该邮报”。宋宅接到电报后,即找律师商议此事。其时“惟因该报日前已有一自行更正之纪事,故现正调查该项更正稿,是否可认为满意,以便决定控诉与否”。

此时恰在日本东京的宋子文在接待《大阪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也愤然指出“此项消息,纯由反对广东人之英人宣传”。并说他“本人对此,实不能终守沉默态度,已请广东政府发电向驻伦敦之代表,在英国法庭起诉英报造作谣言,要求赔偿名誉损失”。

陈友仁对此谣言也予以痛击道,“此乃蓄有恶意的杜造之言,欲放出政治上亵渎神圣之气味,因渠甚尊重孙夫人也”。

■ 1927年宋庆龄在莫斯科与加里宁夫人(右一)等在一起

在这样的合力反击下,荒诞不经的宋、陈“结婚”谣传终于得以平息。

访苏前后建立的深厚友谊

就在此事平息一个多月后,宋庆龄又遇上了一件让她伤心不已的事,那就是帮助她成功离开上海,实现此番访问莫斯科之行的挚友雷娜·普罗梅因病于11月21日在莫斯科逝世。这天正是感恩节,宋庆龄冒着刺骨的寒风,步行穿过莫斯科市区,参加普罗梅的葬礼。普罗梅好友、美国作家和记者文森特·希恩曾经回忆说,“在(普罗梅)葬礼举行的那天下午,我们经过数小时的跋涉,穿过莫斯科,到达新建的火葬场”。“那天天气寒冷。途中,我注意到了孙中山夫人那瑟瑟发抖、微微弯曲的身影。她从中国方面的收入来源已告断绝,而她自尊自重,不愿接受陌生人的资助。她连件冬大衣都没有,只裹着一件单薄的黑斗篷,在阴冷刺骨、冰雪凌凌的街道上缓慢地行走着。苏联外交部借给她的一辆轿车就跟在送葬者队伍的后面,至少车子里总要暖和些。我曾劝她上车,但她不肯。她两臂交叉、低垂着端庄秀丽的脸,亦步亦趋地穿过了这个城市。仅仅几天之前,她的病才痊愈,脸色仍是十分苍白。……她正在早降的夜幕中紧跟着她那公而忘私的朋友的灵柩之后战栗前进”。由此可知,宋庆龄在此期间身体还出了状况,所幸无大碍。

访苏期间,宋庆龄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夫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加里宁夫人是一位质朴亲切而又非常好客的典型俄国主妇,对宋庆龄很热心,经常请她到幽静的乡村别墅共度假期”。后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的床头柜上,一直放着她和加里宁夫人当年在莫斯科的全影照片。当时正在莫斯科第三国际所办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的陈翰笙,曾这样记述1927年他在莫斯科拜访宋庆龄的情景:“当时孙夫人住在莫斯科红场对面一个旅馆里,当时不叫招待所,更没有什么宾馆。我去见孙夫人,见面时就谈谈国内时局,国民党情况,国共合作问题。彼此都用英语交谈,因为不希望别人听到。她不常出门,但经常阅读共产国际的刊物《国际通讯》,我常为该刊写稿。”

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

如果不是因为会见斯大林,宋庆龄也许会在苏联多逗留一些日子,但是1928年春天与斯大林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使宋庆龄感到迷惘和失望”。她说“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陈友仁儿子陈丕士在回忆其父与斯大林的谈话时,也这样写道,“我父亲深信就中国的内部事务而言,俄国人奉行的指导方针不是为了中国的最大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因此,他预言为了他们本身生存的利益,唯有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机器拼死斗争到来时,俄国人才会决定帮助中国”。

1928年5月1日,宋庆龄乘火车离开苏联抵达德国柏林,此后她在欧洲呆了一段时间。直至1929年5月6日由秘书黄琪翔陪同,乘火车从德国柏林启程经苏联西伯利亚回国,以参加不日将举行的孙中山遗体落葬南京中山陵的奉安大典。

5月28日上午十时五十分,当宋庆龄和孙科、宋子良、宋子安等亲属随孙中山灵车从北京抵达南京浦口车站时,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党政领导人等前来迎灵,并在孙中山灵前祭奠,行迎榇礼。现场一片肃穆,两位主要人物相对无言,各自用目光表达着自己感慨的思绪。在这样的场合下,倒是宋美龄身上传导出的感情一览无余,迎着姐姐苍白的面容,她强抑悲哀朝姐姐望去凄苦的一眼,然后上前一步挽住姐姐一只胳膊。宋庆龄似乎已会意妹妹在这一刹那间向她传递出的姊妹亲情,于是她也下意识地伸出一只手,在妹妹细嫩柔软的手背上轻轻拍了下,将自己的一份感情回应给了她。一瞬间,这对姐妹美丽动人的眼眸里都闪烁着一丝晶莹的泪光。然而毕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们很快就恢复了常态。随即宋庆龄和国民党中央领导人谭延闿、蒋介石以及孙科等护送孙中山灵柩前往威胜号军舰,然后驶向南京中山码头……此时宋庆龄心里也一定有所欣慰,因为她毕竟实现了孙中山临终时要求她替他访苏的郑重嘱托。

摘自《档案春秋》

试飞英雄

张子影

2.突如其来的一级空中特情

事实上,在采访中,关于本大队飞行员的任何话题,丁玉清都不需要翻本子,他能纤毫不差地想起很多往事的细节,并且娓娓道来:

一名飞行员一生当中会经历成千上万次的起飞着陆,其中绝大多数犹如过眼云烟,但总会有那么一两次特殊的飞行令飞行员面临挑战,给他以经验,或者让他改变,从而使他对这次飞行的分分秒秒永生难忘。

对于试飞员梁万俊来说,虽然那次飞行只持续了短短4分多钟,但所有的细节如画面般仍然在他的脑海中清晰而鲜活地闪动。

2004年7月1日,西南某机场。雨过天霁,碧空如洗。

指挥所里,一系列的指示声传来:

1号(指挥员):xxx开车。

xxx(梁万俊):开车明白。

xxx:xxx工作好请求滑出。

1号:检查好,可以滑出。

xxx:训练状态,工作好,加力起飞。

1号:可以加力起飞。

13时40分,一发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梁万俊驾驶着某型国产科研样机直冲九霄。

这是一次新机的定型试飞,梁万俊驾驶的,是一架多用途科研样机,价值上亿元。

1.2万米高空。

梁万俊刚做完一个预定动作,突然发现,座舱面上油泵指示灯闪烁。紧接着,油量表指针开始下跌。

他向塔台报告:供油箱油量输油比较快。地面监控也随即发现,油泵灯亮得偏早。

正在塔台休息的雷强听到监控说耗油大,立刻过来,拿过指挥员话筒问:油量多少?

监控回答了。雷强一听就明白,与标准有差距。塔台上,雷强和另外一名指挥员手握着话筒,紧张地分析着。

发动机漏油,仅仅两分钟,油量表指针就指向了“0”。没有油,发动机完全失去了动力。

这是一级空中特情!

指挥所内的空气凝结到了冰点。

按照空军相关条例规定:此时梁万俊有两种选择——跳伞或迫降。

如果说,飞行员是国家用金子堆出来的,那么,一名成熟优秀的试飞员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他们的经验和技术,他们对新机的了解和判断,就是用再多的金子也堆不出来。

但梁万俊和雷强都明白,面对如此险情,跳伞无可指责,以当时飞机的高度和状态,弃机跳伞,只需0.01秒,生命就可以得到保全。

但是,凝聚科研人员无数心血的战鹰就会坠毁,不仅故障原因难以准确查找,新机型的推进也可能因缺乏依据而延宕……

没有任何犹豫,梁万俊便作出抉择:我要滑回去,尽一切可能把样机保住!

在一般人的眼里,如果不是穿着那身特制的飞行员服,相貌清瘦谦和的特级试飞员、空军某部队长梁万俊怎么看都像个邻家儒雅的教书先生。长这么大,他从来不是冒尖挑头的角色。当年招飞体检的时候,全年级大多数男生都去了,他却只是在旁边看热闹,武装部长从旁边经过,说了句:“这个小伙子也可以嘛。”于是,一个工作人员就对梁万俊交代了注意事项、时间,要求明早空腹去体检。

喜出望外的梁万俊一路小跑回去。

一进门,母亲就说:“下了学这么久了你这娃儿跑哪去了?去把红薯洗了,明天早上煮稀饭。”母亲虽然带着埋怨,但声音仍然温和。

梁万俊兴奋地说:“部队来招飞行员,我被选中去体检,明天早上不吃饭了。”

“哦——”母亲答应得平平静静,脸上还是风平浪静的。母亲说:“去把红薯洗了,再把皮削了。”

那一年招飞,广汉一共有5人被录取,梁万俊是其中之一。离开家的那天,父亲取下大儿子手上的表,郑重地戴在小儿子手上。那是一块旧的“上海”表,也是全家唯一的一块表。

母亲的脸上照旧没有看到大的激动,将儿子送出门的时候,她长久地站在门口,不断地轻轻地挥手,直到儿子走得看不见了。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这块表梁万俊一直珍藏着。时常拿出来看看,上上弦,贴到耳边听听它清脆熟悉的走动声。看到表,就仿佛看到母亲温和平静的面容。

懂得

董倩

2.我就是那颗铜豌豆(下)

做选择已是不易,为选择负责,持续付出更难。孩子出生后,六十岁的年龄差异会在很多地方带来问题。带着孩子出去,别人会认为她是姥姥或奶奶,但孩子一张嘴却叫她妈妈。最让盛海琳为难的是,一次孩子病了,她和老伴一起带孩子去看病,保姆抱着一个,她拉着一个,谁都以为保姆是妈妈。盛海琳忙不迭地解释孩子的妈妈是她,不解释乱,一解释更乱,别人好奇狐疑的目光让她得花上比看病长得多的时间去说明来龙去脉。从那以后,老伴就不怎么跟她们一起出去了,因为不想惹麻烦。一来二去,时间长了,盛海琳对这些事也越来越不在意。她心里最要紧的是怎么拉扯孩子长大。

有不少人质疑盛海琳,说她只管自己的感受而不去想孩子的以后,孩子还没长大,他们也许就离开了,那时孩子怎么办?这些担心都对,看起来好像盛海琳一心想生孩子,已经失去了理智。但是,这仅仅是旁人茶余饭后的推理,貌似深思熟虑,其实轻描淡写。还有谁会比盛海琳更深、更细地去考虑这些呢?从失去女儿决定孕育开始,她就要想到孩子的以后,她有医学知识,有健康的身体,即便再老也能出去讲课挣钱,这些因素能够支撑她的选择。盛海琳早早就想明白了,既然她做出了选择,安逸舒适的晚年就跟她彻底绝缘了。

盛海琳尽己所能地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不管出门还是在家都会化上淡妆,穿好看的衣服,眼里嘴角都是微笑。她要让孩子们知道,虽然妈妈年纪大一些,但仍旧是美丽的。只是她心里又不得不承认年龄不饶人。

盛海琳对我说过的一件事就能看到她的无力感。一天晚上,一个孩子从床上掉到地上,要是年轻,一把就捞起来了。但她不能马上去抱,要拿好姿势才去把孩子抱住,一定小心不能闪了腰,否则就没法出去讲课挣钱了。就在这时,另一个孩子也醒了,蹭到她身上哭着要妈妈抱。两个孩子要抱、要哄,但她脑子也木,身体也麻,既没精神又没力气。在那一刻,她才会有无奈和难过,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有心无力。失去大女儿的深夜冰冷刺骨,现在守着两个温暖的小身体,却又从心底冒出一股寒意,想到那个想过无数遍的问题:我60多岁了,一旦什么时候没了,她们怎么办?好在,孩子在希望就在。她不再怕天亮,而是盼天亮,因为新一天的阳光会把深夜的担忧照散。她要抓紧时间,给孩子们挣下一笔钱。

采访的两天,我一直没有正面见到盛海琳的丈夫,他始终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有一次我和盛海琳在客厅说话,一个女儿从爸爸房间里出来,拉着妈妈的手说话。我从敞开的门缝看进去,看不见人,门只敞开了一小会儿,很快就轻轻关上了,她丈夫在门后面。我心里一阵难受。

我问盛海琳,这么忙碌辛苦,为什么丈夫不能帮把手。

当年失去女儿,盛海琳才意识到丈夫对女儿的爱有多深。女儿去世不久,丈夫就申请退休了,提前了一年,他说他站不住一节课了。一到下午六点,她发现丈夫就抬头看时钟,那是因为女儿惯常每天五点五十分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头就那样抬了很久很久,却再也等不回熟悉的脚步。疼得不能自拔的老伴开始酗酒,他甚至期待着能在某次大醉后再也不用醒来。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盛海琳知道,男人的质地比女人硬,但是比女人脆,遭到巨大伤痛的一击,男人会碎。她不去过多要求老伴帮她做什么,他能答应一起去完成生孩子的目标就够了。

我采访盛海琳的时候,她64岁,两个女儿4岁。采访前我琢磨,该怎么称呼她。她是我母亲辈的年龄,我应该叫她阿姨,可是她的女儿比我的孩子还小,她们又应该叫我阿姨。我问她的建议,盛海琳微笑着说:“叫阿姨吧。别人都叫我老太太,我可不觉得自己老。”

采访盛海琳那天,正好是安徽省放开“二孩”政策首日。她拿着印有这个新闻的报纸,沉默许久,对我说:“可惜,我不在这个行列了。”但是,她很快又表情丰富地对两个孩子招手。我心想,她说得没错,她就是那颗蒸不熟、煮不烂、锤不扁的铜豌豆,当生活给她沉重一击时,她趴下了,但又顽强地站了起来。她不是生活的赢家,但绝对是命运的强者。